

“史料与视角：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传统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煦

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史料与视角：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传统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澳门理工学院汇智楼学术会议厅召开，来自内地及港澳18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民间学术团队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与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及提要25篇，其内容包括抗战研究视角、抗战时期政治与新闻制度、抗战区域研究、南京大屠杀、抗战时期中日人物、中日文抗战史料整理、抗战时期的澳门等方面。与会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史料与视角”的会议宗旨与议题，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使用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新的研究视角审视以往研究成果，开展综合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会议主要内容及讨论重点

关于抗战研究的视角问题，过往主要基于中国视野或东亚视角，缺乏整体把握和国际视野，与会者从全球史视野审视已有研究与不足，提出诸多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华着重探讨了抗战史研究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主体区域，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陆上和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海上两个主战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事实上已经超出传统的东亚范围，南亚的印度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直接受到了日本的轰炸，参加对日战争的国家也超出了东亚的范围，因此研究抗战主要基于东亚视角进行分析的同时，亚洲乃至全球视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可缺少。他比较了中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抗战，强调指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具有整体性，各国人民反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具有整体性，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也具有整体性。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一样，它的失败，不是败于某一政权或某一国家，而是败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反法西斯势力的合力抵抗。中国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面前，进行了殊死搏斗，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地域、规模上，中国的抗战都是无可替代和比拟的。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在“东亚的表达”中，认为“亚洲”是一个由欧洲人所给出的一个与“欧洲”相“对置”“对立”的空间概念。欧洲人的思想“暗示”及其日益东扩的“殖民”行动，使率先在东亚地区实现近代化改造任务的日本，敏锐而强烈地感受到了区域担当意识，开始把自身推向世界舞台，并从此展开了以日本的思想和行动为核心的“实体化”亚洲的全过程。但是日本在声言促进亚洲各国“近代文明”化和“国民国家”化的过程中，又先后将“殖民主义”和“大东合邦”等构想强加给区域内各国，加之

其“第三种国际关系体系”的构想必然要与欧美列强发生冲突,因此,近代以来日本的努力最后以“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而走向终结。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郭昉凌认为以新的方法、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加强澳门与中山地缘关系研究、人文环境与抗战文化研究、抗战人物研究,以及抗战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关于抗战时期政治与新闻制度史研究,南开大学江沛对战时国民党党营、抗战与限共的新闻体制作了概要论述,他认为国民党在创建战时新闻体制时,虽然逐步清晰了战时宣传方略,构建了较成体系的党营管理机构,但因缺少系统部署,且检查机构政出多门、标准不一,再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政见龃龉、乱象充斥党营新闻之中,故最终使其运营效果并不好。国民党的战时新闻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局部开放到逐步收紧、又在多种政治力量作用下松紧结合的复杂多元形态,这虽对抗战宣传发挥了舆论推动作用,但苛刻且混乱的新闻检查体制,也使得中共与民间舆论对之大为反感。陕西师范大学黄正林探讨了中共陕甘宁边区的执政问题,认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三三制”改革,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赢得了各阶层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此为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关于抗战区域史研究,会议论文或侧重区域研究,或对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等对1945年至2015年间,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战场、国民党华南抗战、日本在华南的侵略罪行与战争破坏,以及抗战时期香港、澳门等研究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呈现了华南抗战研究70年来的整体概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莹莹则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根据地研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主要成果作了梳理。暨南大学张晓辉以广东阳江和阳春两县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两县的相关档案、报刊,对侧重于开展下层区域抗战历史研究的意义作了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对宁绍战役开始之际,绍兴城突然陷落的因素作了分析,她认为国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风军纪和走私问题,随着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加剧,在抗战中后期日益严重、积重难返,而由绍兴陷落,可以管窥抗战中期前线国军军纪士气、地方社会的战时变迁、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及军政关系的演变等问题。澳门理工学院李长森对香港保卫战中澳门土生葡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暨南大学赵利峰论述了抗战时期澳门博彩业从勃兴畅旺发达,再到畸形繁荣以致陷入危机的发展过程。暨南大学刘龙华和夏泉还对澳门抗战时期中文报纸《华侨报》1942年发表的社论作了探讨。

关于抗战重大事件研究,与会者主要研究了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两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关注的重点是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的宗教生活,他对大屠杀期间传教士群体、难民所的宗教活动、难民对基督教认识的变化、不同宗教之间能否超越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南京大学姜良芹以英、西、意、苏四国为中心,分析了西方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不同反应,她认为尽管西方国家立场各异,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残忍暴行等消息已通过上述国家媒体在国际社会上广泛传播。

关于人物研究,会议论文涉及中日军政人物、艺术家及华商,也有反面人物汉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朝光对中国抗战转入战时状态后,国民政府为因应战争需要而对军事指挥和行政机构作出调整的历史背景作了概要论述,探讨了孔祥熙从赴任行政院院长到饱受责难和辞任的复杂过程,剖析了孔氏与蒋介石互为依存的特殊关系。他认为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其负面影响远胜于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氏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作出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从蒋百里留学日本、德国和在国内从事政治、军事、教育及社会文化活动的经历为切入点,对其抗战救国思想作

王熹 / “史料与视角：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传统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晓娟通过梳理海内外学界关于“日本陆军中坚层”的核心人物石原莞尔的研究现状，对日本陆军中坚层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她认为考察以石原为代表的“日本陆军中坚层”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既可以还原中日战争从局部到全面演变的历史进程，又可增进对日本内部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和机制的了解。澳门教育暨青年局陈继春对1944年避居澳门的书画家筹募同善堂难童餐经费画展的缘起、筹备、经过与产生的重要文化影响，以及高剑父等人在其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等问题作了论述。香港树仁大学莫世祥对澳门华商傅德荫抗战时期的若干史实作了澄清，认为国民政府扣在他头上的“济汉奸”之名不实，应予纠正昭雪。而香港大学郑炜明则以翔实的档案文献资料，列举潮汕陈光烈（梅湖）助纣为虐，多行不义的劣迹，认定他是名副其实的汉奸。

关于史料整理研究，澳门大学汤开建详述中外文献中有关澳门抗战的内容，弥补了以往参考文献的缺如或空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希亮提出充分挖掘和使用日本方面有关抗战的文献，对还原有关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实，纠正其舛误乃至失当或放大之处，甚有帮助。南开大学宋志勇对东京审判资料与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性与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他强调东京审判的史料大多是控辩方精心搜集、整理的证据资料，且大多是经过法庭严格审查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近代日本政治史、近代日本对外关系史、亚太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日美关系史、日本侵华人物、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人物、美国对日政策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深入挖掘并利用好东京审判史料，对深化东京审判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等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温州大学杨祥银对口述历史资料与抗争研究的辩证关系做了阐述。

二、会议的共识与成果

此次会议规模不大，但与会者大多是有关专题领域抗战研究的领军人物或青年才俊，他们长期致力于此项研究，了解其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清楚中国抗战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深谙当今海内外抗战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全局意识，具备较为扎实的学术和文献积累，能够提出新的创见，再加之会前准备较为充分，学术讨论注重新史料的挖掘和使用，以全新视角来阐述抗战研究的诸多问题，讨论问题具体而深入，故会议取得预想效果，并达成诸多共识。

首先，与会者认为，抗战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研究抗战不能局限于中日或东亚范围，墨守以往传统观念和条框成规，自说自话无济于抗战的深入研究。在历史视野方面，也不能无视战争的整体状况，应与时俱进，开拓研究视野，从国际视角，审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和各国人民的反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概貌，做到知己知彼，以新颖视角展现宏阔历史，才能呈现或复原抗战的真实历史场景，否则坐井观天、一厢情愿，就难以恰当地把握中国战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不能恰当地评价中国战场的重要意义，而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难以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更无法讲好“中国故事”。高士华强调，今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在充分认识这场战争整体性基础上，对日本对外侵略和各国人民对日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战场，进行多角度的横向比较，作出高度概括和归纳，采取“走出抗战，比较抗战，外观抗战”的研究路向，以世界研究视野，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

其次，与会者指出，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中国抗战史文献资料的调查摸底、整理刊布、开发利用和资源共享迫在眉睫。尽管当下国家、各级政府、文献收藏单位和科研机构等整理刊布的抗战史料之种类、数量可谓前所未有，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抗战时期的收藏情况不明，没有一

个详细的目录和题解,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文献未被开发出来。二是整理出版的各种专题资料不够系统,研究者获取相关资料还有一定难度,涉及国民党正面战场及国统区的资料仍待进一步发掘。在日伪方面,侧重于日军侵略暴行、抗战损失等内容,其他方面的资料较少。三是文献资料的编选取舍未尽适当。受研究者视野等因素影响,当选未选的资料不少,即使是选录资料较少以原貌或原生态方式呈现,存在人为删节及辨识有误的问题,令研究者难以明了其真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四是关于战时国统区、战时各战区国民党军事作战,战时沦陷区政治军事社会状况、伪军组编作战情况等方面档案的整理出版还不多,其显著问题是一些地方性的、专题性的、行业的档案文献等刊布较少。五是有些口述历史、个人回忆和文史资料中,彼此矛盾、夸大失实之处不少,存在刻意褒贬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因而在没有其他资料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一些抗战论著只能使用这些材料,从而使研究受到很大制约,甚至出现不应有的硬伤或错误。因此,学界的当务之急是摸清家底,编写指南,整合资源,选编刊布最具研究价值的文献史料,构建共享文献资料的大数据资源信息库,为全面系统利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化抗战史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与会者强调,综合运用日文和其他语种文献资料是进一步深化抗战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抗战研究具备国际视野的必由之路。中国抗战研究在这个方面明显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一是对国内各大藏书或研究机构所藏抗战时期日方出版物的整理利用不够。二是对日本所收藏的有关档案文献的情况不掌握。2011年仅“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选录公布的有关近现代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的公文书及其他记录中与亚洲近邻各国有关的资料就有2200万份图像,至于日本政府及各大机构还有多少有关抗战方面的档案文献,还需做长期细致的调查和摸底。三是对日本现刊布的有关日文资料的收集、翻译和利用不够,且对日本学者的研究内容和体系缺乏基本的梳理和分析,对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回应,使中国抗战史的地区话语影响力没有发挥出来。四是对域外各国所记载的有关抗战史内容的文献资料注意不够,仅仅停留在表面,缺乏国际视野或全局观念,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进行比较研究,故中国抗战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主导性不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后中国抗战史研究,只有广泛运用多语种的档案文献资料,采取中外资料结合互补的方法,克服过去史料搜集和使用中,视野局限于国内或本地区的现象,使用多种方式加强国际化表达,善于将中国与其他各国相关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去伪存真,吸取精华,才能大大拓宽研究分析的史料基础,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较为客观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的历史场景和全貌。

第四,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抗战研究必须打破旧的条框限制,解放思想,坚持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优良史学传统,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宏观论述与微观解剖相结合,开展中外比较研究,充分关注海内外学术界新发展趋势,运用相关学科的新理念、新表述来检视和呈现中国抗战历史,及时响应世界抗战史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才能深化抗战史研究的深度、力度,使中国的抗战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具体而言,一是抗战史涉及中外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历史人物、各国复杂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丰富而宏阔的历史现象,因此要明了其前因后果,必须要尊重史实,不能简单堆砌史料,而应注重研究分析其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实事求是,力求避免取材片面、视角单一,才能对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二是研究者只有发挥相应的专业优势与研究特长,充分利用各种中外文献,广泛搜集相关史料,用真实的材料还原历史,才能构建起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三是着力开展中外比较研究,用当下的视角解读历史。要注重国共抗战斗争与国、共、日不同区域内政治、经济、军事、统治手段等方面的比较,搞清楚以往语焉不详的问题,消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争论。同时也要加强中国与日本、东南

亚以及域外其他国家之间诸多共性问题的研究，将抗战研究置于国际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之下，从抗战全局的视角研究抗战，以更为宏观、开放的视角对其进行观察、研究和分析，弄清整个抗战局势或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演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以多样化手段加强抗战的国际化表达，才能揭示其不同的面貌与特点。

第五，与会者充分肯定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在“澳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为澳门的抗战是中国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该所研究团队正在编撰的《抗战研究丛书》系列项目，填补了中国抗战研究的空白。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该所所长林发钦指出，抗战时期，葡萄牙实行中立政策，日本亦未占领澳门，但澳门却充当了周边地区难民庇护所和情报搜集中心的角色，且澳门华人没有置身事外，掀起安置赈济难民、组织爱国人士回国支持抗战的活动，在祖国南海之滨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抗日战场”。该所开展的抗战系列研究包括史料整理、口述访谈、图像分析、专项研究、学术会议和专题展览等方面，迄今为止搜集整理战时澳门出版中文报章约1.8万版，征集抗战文献文物逾1000件，采集抗战幸存者口述历史50人，出版研究丛书4种：《孤岛影像：澳门与抗日战争图志》《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抗战文献文物图录》《澳门人的抗战》，其目的就是要全面真实地展示抗战时期，澳门所开展的“不一样”抗战的真实历史。与会者表示，该所的研究成果，建立在较为扎实的文献文物和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意义。

三、会议的特点与展望

以丰富扎实的中外文献资料为根据，以国际视野和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全面审视抗战的历史过程，不断深化传统抗战史研究，凝聚海内外同仁智慧与共识，共同揭示历史真相，深刻反省历史教训，是当下世界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势。这次会议，反映出中国抗战史研究者未雨绸缪，构建中国抗战史研究模式，主导未来研究发展的自信力，研讨会的特点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研究领域较为广泛，视角新颖。会议论文涉及中国抗战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诸多方面，既有对抗日根据地研究现状的概述、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等问题的探讨，又有对国民党战时新闻体制、沦陷区历史的研究；既有对国民党战时高层人物错综复杂关系的剖析，又有对中日双方军事人物与抗战关系的深入研究；既有对南京大屠杀重大事件的多维描述，又有对东京国际审判资料与抗战研究关系的阐述；既有对华南区域抗战研究的概括与展望，又有对香港沦陷时期澳门土生葡人与澳门战时博彩发展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新思考。

其次，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中国抗战史研究强调采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其宗旨目的不是为装点门面，哗众取宠，而是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概貌，揭示其在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历史意义。在这方面，会议所取得的成效是较为显著的，与会者不仅就其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阐述，还因应日本或西方有关抗战研究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突破教条的、单一思维模式，以国际多维视角，深刻反思检讨以往研究成果，运用综合或宏观与微观的方法，着力在探讨抗战史复杂历史背景、重新审视或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解疑释惑。

第三，强调中外文献的互补与多语种的应用。抗战史的多元区域范畴和复杂的世界背景，决定其文献资料具有跨地域国际性和多语种的特点。过往中国抗战史研究者在文献资料方面，主要以中国的文献资料为主，兼及域外文献资料，但关注不够充分，未能从跨区域和世界视野来深入研究有关问题，因此中国抗战史多局限于国内方面，未能体现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特征。此次抗战史学

术研讨会的主题：“史料与视角”，即因应抗战史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必须改变或突破传统模式，以世界视野和跨区域研究相结合的趋势而相向展开。与会者不仅注重各种载体，包括口述史史料的挖掘整理和考证，而且特别注意多语种的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其中既有日文、英文、西班牙文等资料，又有葡文资料，通过中外多语种资料的比较，做到论由史出，以呈现抗战历史发展的轨迹，由此体现出中国抗战史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第四，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揭示其真相。中国抗战史研究承载的研究课题是多重的，既要研究中国抗战爆发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诸多重大事件、历史人物或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又要研究中日关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由来、动机和目的；既要研究中国抗战与亚洲各国、太平洋战争期间各国人民抗日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探讨中国作为抗战主战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既要阐述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又要因应域外研究者提出的诸多历史问题，阐明我们的主张，以正视听。因此，中国抗战史研究者所肩负的使命，任重而道远，只有不断地开拓创新，增强自身的问题意识，运筹帷幄，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综合应变能力，才能适应新的要求和新的发展。而与会研究者已意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并应对上述诸多问题阐述见解，做好了迎接挑战的理论和研究准备。

[作者王熹，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德明)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出版

李常宝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37.4万字，331页，63元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一书，以西南地区部分县级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的荣誉军人教养院档案为基础，利用当时的一些报纸、杂志、回忆录等资料，考察了国民政府如何对抗战时期的军人伤残问题。该书从宏观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了中国民众对军队、军人的传统认知，南京国民政府征兵制的变迁和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伤残军人的安抚政策与措施。当然，该书重点探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关于军人伤残应对机制的确立及其过程，并通过军政部第三、第七教养院和第六、第十八临时教养院的个案分析，揭示抗战时期国军战力羸弱的程度，分析伤残之荣誉军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他们与荣教机构驻地民众之间的社会关系，比较客观地再现了抗战时期荣誉军人的历史面貌。（徐志民）